

《家》背后的家

巴金的一生，都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。然而在他的人生之中，却有一大憾事，每每谈起都遗憾落泪，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，未能有效地帮助他的两个哥哥。他曾提起两位哥哥都是因为钱而死，然而当他有钱了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帮助两位挚爱的哥哥。

这两位哥哥，以及巴金本人，其实就是《家》中觉新、觉民、觉慧的原型——大哥李尧枚，二哥李尧林，还有他自己。巴金姓李，名尧棠，字芾甘，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族大家，到了巴金这一辈，已经历了五代，巴金出生于家族最兴旺鼎盛之时，他曾在《我的幼年》中提过：“家庭里，有将近二十个是我的长辈，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，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。”

然而巴金在这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大家庭中，就像一个“异类”，如同《家》中觉慧的真实写照。他想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，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他的“格格不入”终让他的抱负得以实现，然而这个过程中离不开两个哥哥的支撑和支持。可是，难道觉新和觉民就不想寻求新的突破吗？其实并不是，只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之下，他们只能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觉慧敢于同这个时代抗争，而巴金之所以能够成为巴金，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两个哥哥的负重前行？

《巴金的两个哥哥》其实先后出版过几个版本，收录了关于巴金本人、巴金家人，以及一些至交好友的各类纪念文章。随着近十年来又逐渐发现的四十年代的怀念杂文和其他史料，再加上黄裳先生等又写出了新的回忆文章，四川文艺出版社将之集大成，增补校订，定名为《棠棣之花：巴金的两位哥哥》。这一版，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。

“棠棣之花”出于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常棣之花，鄂不韡韡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这里“常”意通“棠”，“棣”读音“弟”，“韡”读音“伟”，形容茂盛，用以赞美骨肉兄弟情。

《棠棣之花：巴金的两位哥哥》从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解读，从一个家庭之中，相似背景之下的三种不同命运和人生，来重新认识巴金。巴金曾说，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。他是《家》中觉新的原型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觉新一样活下来。想到大哥的死，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曾两次失声痛哭。

大哥李尧枚是最先新文化引入大家庭的人，他经常买来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阅读并带领弟弟们讨论，是弟弟们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者。李尧枚一直是个成绩优良的学生，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，他希望能够去上海或者北京有名的大学校深造，将来还要去德国留学……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美好幻想，他在幻想这些的时候，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摆脱不了又不能丢下不管的身份——“承重孙”。他要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，他要负担两个弟弟出国留学的费用，他要放弃学业娶妻生子……他要做的太多太多，却没有什么是为自己而做。

李尧枚的担子太重，一个家族都被他抗于肩上，可他偏偏又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“作揖哲学”和“无抵抗主义”者，巴金曾在《做大哥的人》中这样说道：“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，一方面依旧依旧的环境生活下去。”大哥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，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。为了维持生计、振兴家业，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却在一次大病之后，发现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，那时的李尧枚因为各种矛盾的环境和心理，患上了精神疾病，他在发病之时将所有票据撕碎倒掉，于是，这个家彻底走向破产。觉新没有死，可是李尧枚却终究是走上了不归路。

他曾在信中这样对巴金说：“弟弟，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，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，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。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浮的心情，无价的黄金，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，不喜的。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，但是志向却是同的。但是，我俩究竟如何呢？其实呢，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，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，向前乱碰罢了。”

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当初在大哥的支持下，和巴金一起外出求学，他是一个教育家、翻译家，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开放教学，启发了学生的学习思路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学生们每每提及这位老师都心怀感念，他们之中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、叶笃正，作家黄裳，剧作家黄宗江等等。李尧林有才华，有理想，却不得不在大哥去世以后，舍弃这一切，代替大哥接下这个十几口人大家庭的养家重担，最后积劳成疾患上了肺膜炎，不幸英年早逝。

巴金曾说：“我们三兄弟跟觉新、觉民、觉慧一样，有三个不同的性格，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。”那个在他笔下的旧社会封建制度的大家庭，犹如一片孤岛的沙漠，读到大哥给巴金的那些信的时候，不禁被他们的真情所震撼。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两位哥哥，一直是巴金的遗憾，不过两位哥哥的人品、才华和学识，可以通过《棠棣之花：巴金的两位哥哥》被更多人看到，也会让他深感安慰吧。 □默扉

送别流沙河：跌宕起伏又干干净净的一生



人物春秋

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，著名诗人、文化学者流沙河去世，享年88岁。

流沙河出生于1931年，成都人，原名余勋坦。回望一生，流沙河经历过理想的年代，后来被划为右派，开除公职，下放老家劳动糊口，平反复出后回到自己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杂志做编辑，并将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作品介绍到大陆，后来他停止诗歌写作，潜心研究汉字与文化经典。

流沙河的诗作《理想》和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，许多年轻人也都耳熟能详，甚至背诵过“理想是石，敲出星星之火；理想是火，点燃熄灭的灯；理想是灯，照亮夜行的路；理想是路，引你走到黎明。”

如今，蟋蟀不复鸣响，许多文化和

诗歌界的人纷纷表示纪念和惋惜。流沙河的一生“有过曲折和坎坷，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，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，那就是——一辈子干干净净地做人，干干净净地做事，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。”

流沙河是笔名，出自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流沙”。而在1957年，二十六岁的流沙河卷入风暴的巨浪中，一度是“河沉大海”。

蓝英年是流沙河的同时代人，只比流沙河小两岁。1957年，蓝英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的一名助教，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流沙河的诗集《告别火星》。当时，流沙河提议并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刚刚开始运营，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官方的诗歌刊物。

蓝英年觉得流沙河的诗歌清新可喜，他还随口背诵《草木篇》里的句子。“她，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，孤伶伶

地立在平原，高指蓝天。也许，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。但，纵然死了吧，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！”这是流沙河以白杨树为题写的一首诗。

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，这样的诗句很容易招致灾祸，更严重的是，身边与流沙河有关或无关的人都牵涉其中。蓝英年将流沙河的诗推荐给了同屋的舍友老刁，老刁本来从不读文艺书，但很喜欢流沙河的诗，他的弟弟甚至还在团员大会上朗诵流沙河的诗，结果三人全部受到了批判。

流沙河喜欢苏俄文学。当时，他专门写过一首短诗，“留你留不得，藏你藏不住，今宵送你进火炉，永别了，契诃夫。夹鼻眼睛山羊胡，你在笑，我在哭，灰飞烟灭光明尽，永别了，契诃夫。”

蓝英年是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。到了九十年代，苏联解体，他写出了《寻墓者说》，流沙河专门托朋友跟他要一本，并题写了一幅字作为回赠，里面是一首诗。“野外小河边，梨花天涯落秋莎。转眼兴亡悲往事，白发人听后庭花。”

1979年，《星星》复刊，流沙河也摘掉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，在《星星》担任编辑，并加入中国作协。

1981年秋，他在火车上读到了台湾《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，深受触动。第二年，他在《星星》诗刊上开设专栏，并出版了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，为每一位诗人撰写介绍文章，成为当时读者了解台湾诗歌状况的重要窗口，影响十分广泛。

这其中，余光中跟流沙河的缘分最深。余光中生于南京，比流沙河大三岁，战争年代都在巴蜀地区度过，

算是同乡，也是同姓。余光中曾经写过《蟋蟀吟》，“就是童年逃避的那只吗？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？”而流沙河则写了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，作为回应。“就是那一只蟋蟀，钢翅响拍着金风，一跳跳过了海峡，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，落在你的院子里，夜夜唱歌。”

1996年，流沙河退休。尽管不再写诗，但依然关注文学。《星星》前任主编梁平还记得，几年前的一天上午，流沙河到他的办公室聊天，谈起当下的诗歌写作和刊物，流沙河是《星星》诗刊的创始人。梁平印象很深刻的是，尽管已经停笔十几年，流沙河对于诗歌的看法依然很犀利，让梁平感同身受。

流沙河也跟梁平说起自己停笔的原因，一个是现在写出来超过以前的自己，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了；二是现在有的人写诗越来越离谱，莫名其妙，跟生活没有关系，读起来也无法让人感到快乐。他认为诗歌应该对现实有所关照，不能只停留在内心，那样就太无痛苦了。

在诗歌之外，流沙河找到了新的兴趣点，那就是汉字和文化经典。他给海外的一家报纸开过名为《简体字不讲理》的专栏，讲述简体字背后的汉字故事与变迁史，并且在晚年把大量精力用来讲述《诗经》。

晚年的流沙河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书虫”，每天必须读书，至少两个小时。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老式的大床，常读的书搁在床上，占据了半边，被他看作是“命根子”。 □辛闻

“为国收民心耳”

钩沉

陈文龙、陈瓚这两位兴化府城隍庙里的两尊城隍神，几百年来端坐在城隍宝座上，享受于官场的溢赐封号，享誉于民间的祭祀崇拜。他们已超越时空，跨越时代，化身为神灵，走进现代人的灵魂，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，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灵魂依靠。现代人特别是他们的后人，自豪、兴奋、荣耀、引以为荣。

1276年元兵南侵，兴化城陷，陈文龙被俘北去，绝食而死。仅两个月后，叔陈瓚为侄报仇，“侄不负国，吾当不负侄！”带兵杀人敌阵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车裂而死。

这是他们的以身报国，是关键时刻的舍身报国。我们以往的观人经验是看关键时刻，看冲突节点，看危急瞬间，看生死关头，在这些最考验人的地方看人之取舍举动。

陈文龙、陈瓚他们有一个口号或

理念，就是：“吾家世受国恩，当为国收民心耳”。这话对于官至副宰相的陈文龙和辞官不受的陈瓚来说，是真实的肺腑之言。《陈忠肃公年谱》记载：“公在越州判官任时，皇属邸第属越州亲者甚众。公刚直不挠，不可干以私，人皆惮之。”陈文龙考中状元后，任越州（今绍兴市）的地方官。越州是个鱼米之乡，山好水好环境好，鱼多米多物产多，皇亲国戚看这地方，高官富豪向往这地方，凭权势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都往这里钻挤。挤进来的为争风水之地闹矛盾，挤不进来的对挤进去的有意见，外进的与当地住户起纷争。沸沸扬扬，乌烟瘴气，有失民心也！且这地方在他到任之前，屡屡如此，屡失民心。陈文龙到任后下定决心，雷厉风行，肃清弊政，严厉革除，不徇私情，不忌面子，以民为重，关心民瘼，很快政声卓著，民心收回。人们称他“政无大小，悉以询之”。

陈文龙在担任御史期间，发现浙西一带在推行“类田法”时，问题严重，

乱象重重，“吏缘为奸，争以多买为功”。有些官吏借推行“类田法”之名，行利己之实，与民争利，致使“六郡三民，破家者多”。顿时民怨沸腾。这是陈文龙最不愿看到的，这些地方官竟如此不顾民意，逼民起愤。这民心不收还待何时，陈文龙急在心头。而此时收民心只有先除民害，以舒缓民怨。这民害正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大员，他们官官相护，彼此勾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风险大矣。弄不好还会被他们反诬。陈文龙立刻撰写上书，扳倒了有民愤的地方官，民心得以收复。而他却遭到了报复，被贬一级。

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国家兴衰存亡，靠的是民。民的生死存亡，靠的是食。强大的国家，是以民为基础的，民的生存，是以物质为基础的。不能保证民的物质基础，则民亡，民亡，国失基础，则国亡。爱国家，忠于国家，期盼国家强大，如果有这样一颗心，只须做两件事，战时救国，平时固国。所谓固国，就是巩固



陈文龙

国家的基础。具体就是关心民，爱护民，保护民利，保证民需。用陈文龙、陈瓚叔侄的话说，就是为国收民心。

民心，即人心，人的向背之心。这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也是每个人所期盼的。期盼人的向我之心，期盼去除人的背我之心。为国收民心是最高境界，陈文龙就处在这样的最高境界。 □焦仁贵

东大街上看时髦

当年西安有一句民谣：“东大街上看时髦”。时髦也是那年月西安普通年轻人形容漂亮女人的代称。但时髦内涵更丰富，绝不是漂亮女人所能涵盖。我理解其中有追求时尚的新潮，穿戴打扮的摩登，开风气之先的标新立异等等。

西安东大街、钟楼到骡马市这一段，属于西安的金街，一类商业区。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就被人称作西安的上海“小南京路”。因之，时髦莫过于东大街。在一般人意识中，这所谓的“时髦”就是上海人的标识，当然也包括江浙一带吴侬软语的南方人，而东大街是上海人扎堆的地方。最让人眼花的是东亚饭店照相馆，再有钟楼照相馆，加上平安市场口的钟楼电影院，广告橱窗中都挂着染了颜色的中国电影明星照，好像都是1962年新中国首次推出的“二十二大影星”。出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就有赵丹、白杨、张瑞芳、上官云珠、孙道临、秦怡、王丹凤。男的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；女的美艳如花，楚楚动人。皆中国一流的“时髦”也。

记得当年有娃娃们跟着烫头发女人的后面喊：“时髦时髦尻子扭，一扭出咧巷子口，踩了一块西瓜皮，把时髦跌成个啃泥地（肯尼迪）。”把美国总统带进去，特别滑稽。还有我们娃娃时认为“时髦”就是奇装异服，爱打扮的风骚女人，高跟鞋洋袜子什么的。于是，就编童谣嘲笑：“高跟鞋洋袜子，走路像个贼娃子。”意为穿高跟鞋走路看上去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，有点

像贼娃子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样子。家住东大街旁边的降子巷的网友北国风光，说他们上小学时“每当放学或星期天就会在东大街‘压制’时髦势力，也跟在时髦女人后面喊，‘时髦时髦看钟点，尻子一撇十二点。’”还有“时髦太太打洋伞，屁股一扭腰一闪。踩上一摊臭狗屎，把人气得胡叫唤。”听了让人忆想当年的顽皮捣蛋，不由忍俊不禁。

到了1966年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“破四旧”则是对“时髦势力”的一种大规模围剿和横扫了。东大街首当其冲，各个学校的红卫兵都走上街头，集合在钟楼东大街，“时髦”经常出现的中心地带，前后封堵街上行人，见女人穿高跟鞋，就挡住锯掉鞋跟，见男青年穿窄腿裤就剪开裤脚。还有让女人把口红擦掉，把身上穿的旗袍下摆撕开。男士抹油能“跌倒苍蝇滑倒虱”的飞机头，紧裹臀部、裤腿上窄下宽，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的喇叭裤等等都在扫荡之中。让人感到可笑的是，一次拦住了一位把头发烫成卷卷毛的男士，红卫兵围上去压住头拿剪子就剪，还喊口号：“打倒资产阶级流氓阿飞！”被剪者是个老陕，一边挣扎一边大吼：“在老子头上胡剪啥呢？老子这是天生的自来卷。”我当时正好碰上，只感觉一伙革命的红卫兵热血沸腾，狂热喧嚣。那场面，鸡狗叫，乱得一塌糊涂。

与我同住一条巷子白鹳湾的发小王继的姐姐，有一段“文革”记忆很有时代特点。她说忘不了去大上海理发店理发，遇见一位很朴素传统的漂亮女士。理发师问她，要什么发型。女士回答，要革命头！理发师问她革命头啥样子？女士说：“我不清楚，就是革命头。”我的妈呀，不平时那么漂亮个人儿，一开口陕西醋溜普通话说，还一脸不屑的神气，好像只有她是干革命的，别人到大上海是小资来了，一副阶级斗争论。

我在铜川歌舞剧团的一位团友王安国说：“上海人还没有把时髦发型带进西安以前，估计西安人一律都是盖盖头。那时候碎娃如果被剃个盖盖头，是一种奇耻大辱，觉得那是嫁娃头。中学我们班就有一个转来的同学剃着盖盖头，立即被冠以‘嫁娃’的绰号，直到现在。”

大上海理发店是我当年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六十年代能进大上海理一回发，那可是风光透顶的事。如果告诉同学说，我在大上海理的发，他们会投来白眼，以为我在说谎似的。这都因为我一位表兄曾是上海的特级理发师，我有后门可走嘛！

我的诗友商子秦调侃我：“老老兄六十年代就进过大上海理发，的确很牛。记得我那时一直是在南大街的一个小理发店理发，哪里敢进大上海，看来老兄从小就是‘资产阶级’，属于‘时髦’一族。”

尤其是烫发剪发做女活的，全是上海、扬州来的高级理发师。

建国初有一部喜剧电影《女理发师》，是当年中国最当红女影星、有当代美人之称的牡丹凤主演，更是为东大街上的大上海理发店造足了势，传说牡丹凤来西影拍摄《桃花扇》就曾到大上海理发店收拾过头发。理发店橱窗里有牡丹凤烫发的影星照，经常引得路人驻足欣赏。我的老三届朋友，曾在大上海进修过的高级理发师翟茂盛说：“给《桃花扇》中扮演李香君的王丹凤设计发型的，就是我的师傅——扬州人柏顺富。”“文革”前西安唯一的特级理发师。《文化艺术报》原总编陈若星，年轻时风华正茂，一头乌发也正茂，听说她曾被大上海理发店一位五十多岁资深理发师选中，享受免费烫发，为她设计发型，烫发做活时，周围一群理发师众星捧月围着这位老理发师，陈若星隐约听到有人喊他柏老师。最后若星的时髦发型被评为全省理发业一等奖。当时若星顶着这个一等奖的发型，幸福得像花儿一样。

关于“时髦”，深究之发现，时髦也是一种发泄不满或被压抑情绪的表现。时髦与时尚有显著差别，时尚所流行的项目对社会来讲，微不足道，对社会影响很小，时尚



喜剧电影《女理发师》剧照

仅仅流行于某一阶层、社区或某一同质群体；而时髦则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与异质群体之中，更另类。这种另类是与众不同，是年轻人的事，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是酷毙了、帅呆了，是靓，是爽，是怪，是现代的新潮和荒诞，是传统的否定和背叛，是人性的彻底解放。

我本来以为时髦这个名词非常洋气，可能是西方舶来词汇。但一查历史发现，时髦原来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词。《后汉书·顺帝纪》说：“孝顺初立，时髦允集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髦，俊也。”郭璞注曰：“土中之俊，犹毛中之髦。”时髦原本指俊才俊杰之士。 □朱文杰

往事